

经济大萧条时期霹雳的社会及 矿场华工状况, 1929-1933年*

Conditions of Perak Chinese Society and Tin Mine Labour
during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1929-1933

陈爱梅

(TAN Ai Boay)

摘要

这篇论文主要讨论在1929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 霹雳州的华人及矿场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本文使用了官方档案及当时的中文报纸, 以探讨殖民政府的因应策略和华人社会的动向。锡工业的发展依赖世界市场, 锡矿业的萧条使工人饱受痛苦。动荡的时代也使小人物浮上历史的舞台, 本文将透过文献, 拼凑苦难的日子, 共济患难的故事及后来对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影响。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929-33 on Chinese society and tin mine workers in the state of Perak. Based on the records and document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and the Mines Department of FMS as well as Chinese newspaper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the impact and the actions and policies taken by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y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As the tin mining industry was dependent on

* 本原文载节及修改自作者硕士论文 Tin Miners in Perak during the Depression Years, 1929-1933 (2006)

陈爱梅 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E-mail: tanaiboay@hotmail.com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06

the world marke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depression on tin mining labourers were severe. By sieving through the documents, the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life and sufferings of ordinary labourer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subsequent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前言

我们无法确知什么时候华人开始在马来亚进行采矿 (Everitt 1952: 54), 虽然 19 世以前已有不少有关矿业的发展记载, 但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莫属于隆加发 (Long Jaafar) 在拉律 (Larut) 发现大量的锡矿后引进华工, 这也使他与槟榔屿华商建立起合作的桥梁。在 1911 年, 霹雳华人总人口共计 217,206 (Pountney 1911: 21), 但在该州从事矿业的华人就有 102,003 名,¹ 换言之, 霹雳州每两个华人当中就有一人从事与矿业相关之工作。锡矿业是霹雳主要的经济命脉之一, 虽然到了 1920 年代末期, 西方人掌控锡矿业的比率超越华人 (Yip 1969: 164), 但矿场中的工人还是以华人为主。锡矿业因全球经济不景气而受挫, 华人矿工首当其冲。这篇论文主要讨论在 1920 年代末期及 1930 年代初期, 全球陷入经济大萧条, 霹雳社会的华人, 尤其是华人矿工的动向, 民间的互助及经济复苏后的发展。

一、经济大萧条对锡矿业的冲击

1920 年初期锡价虽然滑落, 矿场工人数目也随之减少, 但相较于 1920 年代末期及 1930 年代初期的经济大萧条, 1920 年代初期的不景气还算轻微。1929 年 10 月, 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 经济风暴横扫全球。马来亚以输出锡米及橡胶为主要外汇来源, 锡米及橡胶的输出又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紧紧相扣。于是乎, 马来亚陷入了经济的困境, 各行各业都弥漫著失业的浪潮。

霹雳, 马来亚锡矿业重镇之一的州属, 更呈一片哀鸿。由于消费市场需求量的递减, 使锡价也不断往下滑落。锡价由 1929 平均价格每担 104.375 元降至 1930 年的 72.89 元。到了 1931 年, 平均锡价更是跌至每担 60.29 元的谷底 (如表一所示)。

表一：霹雳州锡米产量、税收及锡米平均价格，1925-35

年份	总产量 (担 / Picul)	价值 (\$)	出口税 (\$)	平均每担 的价格 (\$)
1925	515,582.00	68,072,664.00	9,569,798.00	131.775
1926	515,794.00	74,578,654.00	10,658,938.00	144.59
1927	610,157.00	88,430,054.00	12,506,560.00	144.93
1928	685,983.71	78,178,283.00	10,744,590.00	114.18
1929	718,281.05	74,963,169.00	9,970,351.00	104.375
1930	668,099.52	48,945,372.00	5,910,549.00	72.89
1931	546,122.67	32,465,493.00	3,565,725.00	60.29
1932	283,818.73	19,790,680.00	2,261,715.00	69.76
1933	241,176.67	24,051,644.00	3,129,535.00	99.99
1934	339,423.54	38,830,883.00	5,589,276.00	114.41
1935	420,801.34	46,785,792.00	6,339,922.00	111.32

资料来源：Everitt, 1951: Table IC

限制锡生产量

为了挽救日益低迷的锡价，英国（马来亚和尼日利亚）、荷兰（荷兰东印度群岛）和玻利维亚同意签署第一届国际锡协合约（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² 合约期效由1931年3月1日至1933年12月31日，签署国需减少锡产量，以平衡生产及消费的数量。

在签署国际合约之后，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制定“1931年锡与锡块限制条例”（Tin and Tin-Ore Restriction Enactment 1931），以有效地控制及管理锡米的生产、销售和出口等，并惩罚违触法令的人。³ 在这项条例下，矿场每个月生产的锡米不可超过所限制的固打（quota）配额。

矿务督察员（Inspector of Mines）直接执行这项法令，他不只是管理锡矿的生产量，也会把向矿家收购过多锡米的买家控上庭（MDBG 168/31）。锡价低廉加上产量的受限，许多矿场纷纷倒闭。部份矿家为了求取生存，纷纷采取合并（grouping）的措施，以获得更多的产量配额。于是，更多的矿场停止操作，使市场上顿时增加了许多人力资源。1920年

代，超过百份之九十在霹雳矿场工作的劳工是华人（Tan 2006：附件二），矿场的停顿使华人劳工首当其冲，饱受失业之苦。霹雳矿工人数由 1929 年的 65,411 人减至 1932 年的 23,736 人，即百份之六十四的劳工离开了矿场。马来联邦橡胶业劳工，在 1929 至 1932 年之间减少了 133,180 人，即减少了百份之五十一的人力。各行各业都笼罩在经济风暴之中，⁴ 市场上并没有可吸纳这些人力资源的空间。除了劳工阶级，许多有技能的人也失去了工作。

二、社会问题

经济不景气加剧社会问题。失去了工作，表示失去了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能力。在经济萧条时期，犯罪率和自杀率都呈居高不下的局面。

飙涨的犯罪率

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华民司政署（Chinese Protectorate）成了华人寻求协助的机构。失去丈夫的妇女会请求华民司政署帮她找回丈夫（《益群报》1932 年 9 月 26 日）；夫揩女逃，替妇也只知往华署投诉及寻求协助（《益群报》1932 年 9 月 5 日）。无家可归的老妇人，也寻求屈身于华民署侧之车房处。然而，这位老妇人在出外行乞期间，她的几条破衣裤、水烟筒、银饰等全副身家，共六元余，回“家”时也发现全被人窃走了。（《益群报》1932 年 9 月 20 日）华民司政署不是万能的保护扇，但这也显示“红毛政府”某种程度上已获得华人的信任。

社会底层的身影，在经济不景气时浮现在文字记录档案中。这一群人悲哀的命运，只能透过泪水做无声的控诉。他们不懂经济理论，只知道突然间大家都没钱，或家人因贫穷而死亡了。有些更失去了谋生的能力。贫穷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但贫穷却是能使人犯罪。在法院上，上演著这样的情节：

妻听夫被判坐牢九个月，急哭趋前，向法官请求开恩稍减状罪，言时情状悲切，且手抱幼儿亦哭泣甚悲，法官说明法律所以，不

能徇情后，乃令妇人出庭去。（《益群报》1932年9月20日）

马来亚之公众道德日坠落，即失业问题之严重，结果使彼等心术日渐邪歪，此等不幸与贫穷所造成之事实...。咖啡店，用女招待招徕生意.....”（《益群报》1932年1月18日）

霹雳以锡矿为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锡价左右着州内的经济状况及治安。1920年代中期，锡价行情大好，州内犯罪率也相较减少。犯罪率在1929年后呈直线上升之势，1929年的犯罪案件由1928年的491宗上升到718宗，1930年逼近千宗，在1931及1932年突破千宗（如表二所示）。

表二：霹雳州犯罪案，1920-35

年份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案件	426	347	306	294	319	291	394	512
年份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案件	491	718	923	1035	1074	843	562	587

资料来源：AR Perak 1920-35

治安不靖的问题是全面性的，据马来联邦的年鉴报告：

The year 1930 was an extremely difficult one for the Police. The serious slump conditions which prevailed at the end of 1929 not only continued, but grew steadily worse. Large numbers of mining coolies and rubber tappers were thrown out of employment and there were no other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which the unemployed could be readily absorbed. (ARFMS 1930: 45)

在这些犯罪案件中，入屋行窃的案件增长最快，由1929年的269宗增至1930年的570宗，1931年又比去年增加169宗，到了1932年，入屋行窃案件高达703宗（Tan 2006: 95）。入屋行窃案件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对食物的需求（Nadaraja Kannan 2002: 249）。在近打区，根据马来联邦警方的报告，在该区行抢的都不是专业盗贼，而是失业的苦力，他们到店里

吃霸王餐 (CO 273/566: 83)。政府担心, 社会的不安会导致马来亚受到共产党的威胁 (CO 273/566: 88-89)。

治安问题引起媒体的关注, 在 1932 年 5 月 16 日《益群报》本坡版的 22 则新闻中, 与失业相关的就占了 7 则, 其中 6 则都与治安有关, 比如“匪徒械劫咖啡室”, “小童子也做偷儿”等。此外, “私酿酒案也层出不穷” (《益群报》1932 年 6 月 8 日); “花会赌博, 死灰复燃” (《益群报》1932 年 5 月 23 日); “不景气中赌博成了奇特谋生术, 人数众多以致途为之塞” (《益群报》1932 年 9 月 21 日) 等, 这类报导在那时期很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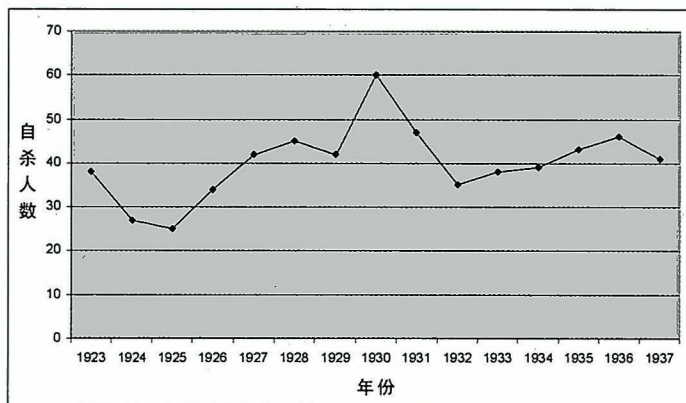
矿场内, 有苦工偷卖矿场电线, 事迹败露而被捕 (《益群报》1930 年 1 月 16 日), 也有因偷锡米而被控上法庭的 (MDBG 113/32)。除了内贼, 矿场内也面临外盗的威胁。洗劫矿场的歹徒, 多是集体打劫。 (《益群报》1930 年 5 月 16 日) 刚卖锡米的矿家, 或刚领薪的矿工都成为歹徒下手的对象。 (Tan 2006: 96) 这些都是有计划的行劫, 非见财临时起意。矿场内矿工生活困苦, 但在歹徒眼中, 矿场还是一块有利可图的肥肉。

限制锡量生产及锡价的跌落使许多矿家宣告破产, 但在一般人眼中, 他们还是有钱人。1931 年, 马来联邦发生十一宗的绑架案, 全部来自霹雳。近打区, 马来亚含锡量最丰富的区域, 在 1932 年就发生了九宗绑架案。当时, 近打区受以 Lee Fong 为首的流氓党匪所威胁 (Nadaraja Kannan 2002: 39)。

经济不景除了与治安不靖有著密切的因果关系外, 在霹雳州, 锡矿业行情与发展跟州内的自杀人数也呈一定程度的对比关系。

自杀人数的增加

在两战期间, 霹雳州自杀人数的高峰发生在 1920 年代末及 1930 年代经济大风暴时期。如图一所示, 1925 年, 锡矿业行情大好, 州内的自杀人数降至 25 名; 反之, 在锡价往下滑落, 经济突然不景气的 1930 年, 霹雳州内共有 60 人选择自我了断。



图一：霹雳州 1923 至 1937 年自杀人数

资料来源：各年代之《霹雳年鉴》(AR Perak)

在经济不景的大风暴下，波及的不止是低层的劳力，在社会运作正常的状况下“生存”得很好的白领阶级，在大环境的突然改变中也不免受影响。在失业浪潮中，文书阶层也引起政府的关注。1930年，华民司政署针对华人宗亲团体和互助会进行一项调查，发现失业者当中很多是有技能的工作者。1932年5月，一位学贯中西，年龄三十八的青年，原来在胶园当书记。胶价大跌，这名青年没能逃过失业浪潮的波及。储蓄用完了，他五天没进食，走在路上，看到一把破旧的菜刀，突然发狂似往自己颈部乱砍（《益群报》1932年5月23日）。

穷，能令人发狂，身体强健者，为了挣口饭吃挺而走险，抢夺他人的金钱或食物等物资，反正已“烂命一条”。不愿意，或无能力伤害他人者，或选择自我伤害。因为失业，有的选择跳火车寻死（Nadaraja Kannan 2002: 283）、有者则割腹自尽（《益群报》1932年6月10日）或跳湖求解脱（Nadaraja Kannan 2002: 294）。矿场中，失掉工作的工人，生活对他们来说，苦不堪言。1932年6月，在怡保一矿场，有一苦力，在矿务公司的一小茅棚中，竟以火油自焚。当公司见苦力棚中起火而去援时，死者已被烧成焦炭（《益群报》1932年6月14日）。先往自己身上倒油，再点把火往自己身上烧，是怎么样的痛苦使他选择了这条无比痛苦的绝路？

矿场中最“方便”的死法就是跳湖。停工的锡矿湖中发现男性的尸体，因此，矿工可能是“感生活困苦，萌厌世之念”（《益群报》1930年7月11日）。绝大部份的矿工是文盲，他们不会写字，所以没有留下遗书。况且如果是孑然一身，谁又会去在意呢？顶多是，中国的亲人，再也收不到南洋亲友汇来的金钱。

三、寻找解决之道

面对日益增加的失业劳工，政府及华人纷纷寻找对策，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遣送回国

华民司政署的官员被委任为副劳工主管（Deputy or Assistant Controller of Labour），以处理华工问题（*ARFMS* 1929: 56）。华工虽然面临减薪，但在这非常时期，只要有工作就可以了。

更多的人是丢掉了工作。市场上出现剩余的劳力，政府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有计划地遣送他们回国。对于政府而言，遣送他们回去比把他们留在马来亚所需的费用较便宜（Nadaraja Kannan 2002: 84）。政府遣送的对象，除了自动选择返回中国者之外，也包括经由医护人员（Medical Officer）检查后，被认为不适合留在马来亚的劳力。在1930年7月，联邦政府共花了\$15,000遣送被医务人员证实体弱的劳工回中国。接下来的月份，政府又花了\$10,000的遣送费。每一个遣送劳工所需的费用平均是\$17，长长名单上的众多劳工等待被遣送（CO 273/566: 4）。从1931年3月至9月，即是在实施管制锡矿法令的首七个月中，政府共花费\$323,735遣送21,365劳工回中国（CO 717/77: 103）。同年，在联邦议会（Federal Council）上，政府另拨\$310,000遣送费。华民司政署资遣老弱回国，请求者多为妇女及奄奄一息的可怜人，有人到了华民署，已不省人事（《益群报》，1930年7月16日）。

在霹雳方面，1931年8月至11月，霹雳的华民司政署遣送13,584失

业劳工回中国 (*AR Perak* 1931: 40)。隔年, 共有 10,007 名失业劳工被遣送回国 (*AR Perak* 1932: 49)。遣返变成种自愿性的。怡保华民署遣资华民回国, 前往讨船票者纷纷, 一日之间竟达千余人 (《益群报》1930年5月19日)。当消息传出后, 往华民署讨船票者络绎于途 (《益群报》1930年5月27日)。华民署、旧巡补厅、矿务衙门等骑楼下, 每晚均睡满华人。为了抢到船票, 华民横冲直撞, 导致门被冲破了, 最后得出动警察捉人, 以维持次序 (《益群报》1930年5月28日)。

隔天, 霹雳政府就宣布停办遣资华侨回国的活动。霹雳华民护卫函称“本政府关于请求遣资失业华工回国之事件, 经于即日起停止举办, 即希转知贵会各埠通讯处, 切确向众宣布。”船票停止发给的消息使华民紧张惶恐, 于是各社团为失业工人呼吁联名盖章上书商会会长梁燊南 (《益群报》1930年5月31日)。在霹雳中华总商会七人代表团 - 梁燊南、胡重益、王振东、刘伯群、利展麟、杨宽裕及曾松寿组成的中国难民委员会, 代表向政府求情 (《益群报》1930年6月1日)。华护司政署终于允诺再发出 1,677 张船票, 分别送返香港及汕头。为了避免外埠的失业工人听到怡保再发船票而拥进怡保, 当局决定即日在每人右臂盖有商会的印章, 凭印而登记。欲返回香港者在商会登记; 返回汕头厦门者在福建公会进行登记 (《益群报》1930年6月4日)。在等待回返期间, 商会继续举行施粥义举, 其中矿家刘伯群捐白米几包 (《益群报》1930年6月6日)。商家广利、新广利和吉承隆等, 报效米及咸菜施粥济饥; 霹雳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为中国难民委员会筹款, 附议将钱拨些作施粥; 各社团代表维持次序, 指挥来往。

在槟榔屿的失业劳工, 前往华民署索船票不果, 派代表求见中国驻槟领事要求遣资回国也未得要领 (《益群报》1932年6月2日)。南洋梦变成风餐路宿, 回乡竟也成了一种奢望。饿着肚皮是想象原乡的温饱, 可是原乡可有温饱?

在 1930 及 33 年间, 约有 50,000 在矿场工作的中国劳工被遣送回国, 这项工作对政府而言, 是有效地面对经济大萧条的办法 (Nadaraja Kannan 2002: 104)。

(二) 政府及民间救助

为了缓和劳工失业状况，政府进行几项计划以吸纳市场上剩余的劳力（见 Tan 2006: 103-105）。可是，政府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还是僧多粥少，因此，华民司政署在华人报章上呼吁：

公启者自胶锡两价均剧烈降落之余，一般矿商圈者，为避免巨大之损失，多实行停止采割，或税减工人，节制粮食，以期稳渡难关，徐图补救，而华工之失业，遂因是而愈多，其甚者且至宿食无门，贫病交迫……总之本司对于现在华工不幸之遭际，良用惋然，深冀常以乐善好施，闻世之华侨大士，一本其好善之心，以后以凡遇踵门求食之人，除给予饭食外，尚幸多与一点蔬菜，以济人命……（《益群报》1930年7月5日）

在1930年的 *The Straits Times* 上，出现了人找工的广告：“Victims of the Slump, Can You Help These Men?” 这些在英报上出现的“Victim”都是白领阶级。欧人也组织起失业委员会，力求多方面救济失业的欧人。海峡政府，对欧人失业委员会的支助，一掷就是五千元（《益群报》1930年12月9日）。相较之下，华人组成的失业委员会，都是以自救为主。各区域华人自救会团体纷纷成立。吉隆坡、双溪大年、檳城等也都成立失业委员会（《益群报》1930年7月25日；7月1日；7月19日；12月12日）。

除了提供失业人士食物外，失业华工赈济委员会也扮演替失业劳工找工作，及遣送华工回中国的中介角色。1930年12月，源光栈主人代理和丰轮船公司，收取低廉的船票，让华工回国。扣除五元回国的船票，当局把另五元换成中国钞票，使回国的劳力返回到中国后有钱可领，这些资遣的费用，都由政府给予。失业华工赈济委员会，则向遣返回中国的工人，每人发分 \$1，以便购买船上所需（《益群报》1930年12月2日）。

患难中有人趁火打劫，但是，患难也是见真情的时刻。陈永、张郁才、Chin Wing、Loke Wan Yat、胡文虎等都施出了援手救济失业华工（《益群报》1930年7月21日；*The Straits Times*，1931年3月7日；《益群报》1930年12月26日）。除了大慈善家，民间小人物也有发心自动救

济者。在源成号前发粥救济, 是一位年老的妇人而已(《益群报》1930年7月21日)。周绮华女士, 解囊倾助贫侨回国(《益群报》1932年3月3日)。个人发心的救助, 虽然是短暂性的, 但也可暂解困苦中的人暂时的饥饿之苦。

(三) 另谋出路

救贫不是长远的办法, 况且非欧人失业救济会, 杯水车薪(《益群报》1932年3月2日)。于是, 华社中就有辅助失业劳工从事其他行业的声音。锡价起价无望, 失业委员会经费去一文是一文, 没有补助增益的办法, 所以有人建议倒不如教导他们一些手工艺, 如制造纸花和小孩玩具, 所售得到的费用, 可充会费及个人零用(《益群报》1930年12月8日)。

除了给失业劳工寻找可能的工作机会外, 最实际缓和失业的方法, 对锡矿业来说, 就是增加锡的销量。1930年12月, 马来西亚工程会在霹雳召开会议, 对于锡矿工业做了讨论, 认为应由政府收购市面上大宗锡米, 以清锡米在市面上的疲滞, 并可供科学家研究锡的其他用途(《益群报》1930年12月22日)。

从矿场及胶园失业的工人, 转移工作阵地, 到吉隆坡、怡保等都市寻找工作机会。檳城也是他们的最爱。一大早, 他们, 几乎全是华人及印度人, 聚集在海墘(Weld Quay)等待工作(Nadaraja Kannan 2002: 133)。

相较于华工, 马来人在失业风暴中所承受的痛苦就来得低, 这是因为他们主要的行业是从事农业, 尤其是种植稻米。1931年, 马来联邦共有92,319人从事耕种稻米的工作, 马来人占89,122人(Lim 1977: 248)。他们拥有土地, 即使在失业后也可回到土地上耕种, 免去饥饿的痛苦。

华人的命运就截然不同。在议会中, 华人议员寻求协助, 以帮助失业的矿工。梁桑南要求更多的土地, 让华人可以靠耕种过活。但是, 这项建议遭到王储Raja Abdul Aziz的反对。他表示, 华人可以很容易获得工作, 但马来人多数是以耕稻为生, 他们很少经商。他认为, 华人贫穷者, 可以返回中国, 如同欧州人, 但马来人却无处可去了(《益群报》1931年7月12日)。王储极力争取马来人的权益, 包括建议政府让在小面积土地耕种

的马来人免付费。苏丹支持这项建议，但近打县议员反对（MDBG 8/32）。

1929年，农业华人副督察官（Chinese Sub-Inspector Agriculture）在近打区“发现”了100英亩的菜园。还有一些菜园是在华都牙（Batu Gajah）的废弃矿区。面对这样的状况，政府采取闭一只眼的态度（Loh 1990: 84-85）。近打失业委员会（Kinta Unemployment Committee）在考虑鼓励矿场工人改行种植蔬菜的同时（MDBG 119/32），霹雳州政府在1932年就发出30,970张短期工作执照，以作为缓和失业的政策，及使人们继续留在这个国家（Lim 1977: 206）。霹雳南部的蔬菜种植区共有873英亩，而其中750英亩是在近打区。除了种植蔬菜外，稻米、菸草、花生和木薯等也成了霹雳劳工的收入来源。马来半岛主要含锡量所在的近打区，在1930年代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耕地。1933年，近打区就发出了17,000张临时职业执照（TOL）（Loh 1988: 31-32）。

四、1933年之后

1933年之后，全球经济渐渐苏醒，锡价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锡合约的有效性跟著回升。经过这次的经济风暴，华人退让掌控锡矿业主导权，欧洲人的铁船公司在霹雳矿业成为主导性角色。

根据矿务局的报告，1929年有107,000的华人劳工在矿场工作，他们生产将近31,000吨的锡，而欧洲人生产37,000吨的锡。到了1933年，矿场受雇的华人只剩下37,000人，虽然后来增加了一些，但他们在该年只生产了8,000吨的锡米，而之前一年是14,000吨。另一方面，西欧人在1933年的锡产量为15,862吨，之前一年达27,000吨（*The Times of Malaya*，1939年12月11日）。

1933年，政府为管制华人男性移民而制定了“外侨法令”（Alien Ordinance 1933），这法令始料未及的影响是：华人女性增加了（Blythe 1947: 103）。1935年，马来联邦每个州属的出生率增加，百分之六十的增加率来自华人，这是因为华人女性人数的增加。华人的出生率超过马来人（*ARFMS* 1935: 8）。

1933年之后, 矿务局的档案亦见要求引进中国劳工的申请。在霹雳, 客家劳工是矿家的最爱, 接着是广东籍。⁵ 1936年, 霹雳华人矿工就比之前一年增加了约9,000名。英国殖民政府对华人矿工评论是“矿场里的华人苦力对制造霹雳的财富极为重要, 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 (*AR Perak* 1935: 93)。

除此之外, 霹雳社会的治安有所改善, 人民的工资也获得部份的改善。然而, 随着锡价的调涨, 非法采矿的活动也增加了。有人在政府地非法采矿, 也有女性在没有琉璃准证下进行淘洗锡米 (见 Tan 2006: 128-129)。另一项在1934年后常出现在报章的社会新闻之一, 就是示威活动的频密。这些示威活动主要是要求加薪。华民司政署介入谈判, 但并不是劳工的要求都能如愿以偿 (见 Tan 2006: 129-131)。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 华人矿家面对与欧洲矿家分配固打的谈判问题。经济复苏后, 霹雳华人矿家决定组成一组织以维护他们的权益。霹雳华侨矿务公会 (*Perak Chinese Mining Association*) 创立于1935年5月5日, (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 2002: 160)。该会在1936年注册, 与霹雳矿务及种植公会 (*Perak Mining and Planting Association*) 分开。霹雳华侨矿务公会由当时著名矿家及领袖如刘伯群、梁燊南等所领导, 其工作主要是向会员解释及翻译矿务法案、决解矿务纠纷、准备地图及法律书籍, 解决会员的矿务疑虑 (MDBG 439/36)。

经济大萧条之后, 殖民政府寻找发展欧洲人矿务的机会, 并尝试在矿场推行以西方的管理方式。1934年, 矿务局 (*Warden of Mines*) 建议所有的矿场必须要有矿场经理, 但这项建议被怡保矿务督察员 R. D. Madew 所反对。他说, 对于小型的华人资本家, 他们没有能力聘请受过教育的经理来为他们监督矿场。况且, 一些老板自己每天花三、四个小时监督自己的矿场, 苦力中的‘头人’ (*Kepala*) 也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MDBG 38/34)。

许多华人矿家无法躲过锡价滑落及控制锡产量的经济风暴而走向倒闭。但是, 也有不少华人矿家挨过低潮, 并且一步一步开创自己的事业。除了梁燊南外, 霹雳州另一位令人瞩目的矿家就是刘伯群, 后来成为霹雳州重要的侨领。

五、小结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劳工饱受失业之苦。经济不景气造成社会治安不靖，选择自我了断的人在社会动荡的时代也明显增加了。为了缓和失业人口的攀升，殖民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遣送劳工返回中国，增加公共工程以吸收剩余的人力。

由于缺乏政治上实际的力量，华人以互助方式渡过艰辛的日子。动荡时期考验人性，纵然有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者，但也有动荡携手行，显现了共济患难的人性光辉。经济大萧条使许多矿场倒闭，大量华人被遣送回中国，但是，这全球性的风暴过后却使更多华人女性迁移到马来亚，成为华人由过客心态过渡到视这里为家园的重要历史因素。经一事，长一智，霹雳华侨矿务公会的成立，华人矿家渡过艰难时机，更了解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并准备迎接前方重重的关卡！

注释

- 1 Tan 2006: Appendix 2。换言之，大约每两个霹雳华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从事矿业。统计数目不包括洗琉璃工作者。1911年，霹雳共发出7119张琉璃准证，而绝大多数的洗琉璃工作者是华人女性，见陈爱梅2006。
- 2 Siam 在1931年9月1日答应签署该条约。
- 3 相关条文见 FMS Government Gazette, April 1931. No. 9. Vil XXIII, Notification No. 3229, Enacement No 23 on 1931, p. 275.
- 4 见 ARFMS No(41) in SCA. 184/1930
- 5 见 MDBG, 353/34, 354/34, 367/34, 379/34, 353/34, 354/34, 3/35, 59/35, 71/35, 144/35。在这些申请文件中，多数都注明了希望引进的劳工籍贯及人数。

参考书目

- 陈爱梅〈霹霹州客家琉璃女性史料护保〉，发表于《马来西亚客家学学术会议》2006年8月26日，华社研究中心主办。
- 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怡保：名珠印刷公司。

《益群报》，1930年1月16日；5月16日；5月19日；5月27-28日；5月31日-6月6日；7月1-2日；7月5日；7月11日；7月16日；7月19日；7月21日；7月25日；12月2日；12月8-9日；12月12日；12月22日；12月26日；1931年3月7日；7月12日；1932年1月18日；3月2-3日；5月16日；5月23日；6月8日；6月10日；6月14日；9月5日；9月20-21日；9月26日。

Annu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ARFMS) 1930

Annual Report Perak (AR Perak) 1920-35

BLYTHE, W.L. 1947. Historical sketch of Chinese labour in Malaya. In *JMBRAS*, Vol. XX, Part 1.

Colonial Office (CO) 273/566, Unemployment Amongst Chinese Labourers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 717/77, Federal Council Minutes, 16th and 18th November 1931

EVIRITT, W. E. 1951. *A History of Mining in Perak*. Federation of Malaya: Inspector of Malaya.

LIM Teck Ghee 1977. *Peasant and Their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olonial Malaya 1874-194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H Kok Wah, Francis 1988. *Beyond the Tin Min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in mines coolies to agricultural squatters. In *The Underside of Malaysian History*, edited by Peter J. Rimmer.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Mines Department Batu Gajah (MDBG) 168/31, 113/32, 119/32, 38/34, 439/36

Naradaja Kannan 2002. *Kemelesetan Ekonomi Dunia 1929-1933: Kesan Socio-Ekonomi fi Negeri-negeri Melayau Bersekutu*,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Penang: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POUNTNEY, A. M., 1911. *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London: Darling & Son LTD.

TAN Ai Boay 2006. *Tin Miners in Perak During the Depression Years, 1929-1933*, unpublished M. A. thesi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The Straits Times, 7 March 1931.

The Times of Malaya, 11 December 1939.

YIP Yat Hoong 196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n Mining Industr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